

九州四海風雅同

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

蕭啓慶

元朝是中國史上前所未見的一個多元族群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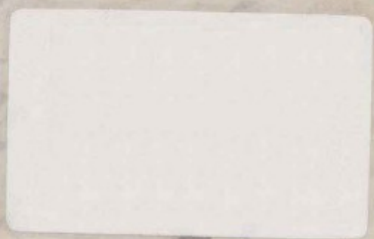
除了有漢人，還有蒙古、色目人等

多族士人圈的形成，

為族群融合跨出重大的一步。

這些家族的後裔，

在明代也都與漢族士人融為一體。



元朝是中國史上前所未見的一個多元族群社會。過去在一般印象中，蒙古、色目人高高在上，對漢文化極少接觸，各族菁英可說是相互隔離，欠缺統合。

本書的主旨是：元代中期以後，一個日益壯大的蒙古、色目士人群體業已出現，而且蒙古、色目士人與漢族士人交往密切，形成一個多族士人圈。

本書自四個方面論證此一主旨。第一：蒙古、色目士人群體的出現與成長。第二：由於文化素養相同，各族士人乃能形成同鄉、姻親、師生、座主門生與同年及同僚等關係，而這些關係更進一步成為各族士人間密切交融的一個網絡。第三：集體文化互動之頻繁。第四：士人群體意識之凝聚，顯然各族士人之群體意識已凌駕族群意識之上。

總之，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雖然對當時的政治與社會影響不大，這些蒙古、色目士人家族也未真正漢化。但是，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已經為族群融合跨出重大的一步，這些家族的後裔在明代都與漢族士人融為一體。

GPN : 1010101177

ISBN 978-986-03-2794-6

00580



9 789860 327946

建議分類：中國歷史、元史、中國土族

K28
2013K

院士叢書

九州四海風雅同

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

蕭啓慶 著

中央研究院
聯經出版公司

院士叢書

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

2012年6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58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 者	蕭 林	啓 載	慶 爵
出 版 者	中 央 研 究 院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叢書主編	沙 淑 芬	校 對 呂 佳 真
地 址	台 北 市 基 隆 路 一 段 180 號 4 樓	封面設計	蔡 姪 岑	
編 輯 部 地 址	台 北 市 基 隆 路 一 段 180 號 4 樓			
叢書主編電話	(0 2) 8 7 8 7 6 2 4 2 轉 2 1 2			
台北聯經書房	台 北 市 新 生 南 路 二 段 9 4 號			
電 話	(0 2) 2 3 6 2 0 3 0 8			
台中分公司	台 中 市 北 區 健 行 路 3 2 1 號 1 樓			
暨門市電話	(0 4) 2 2 3 7 1 2 3 4 e x t 5			
郵政劃撥帳戶	第 0 1 0 0 5 5 9 - 3 號			
郵撥電話	(0 2) 2 3 6 2 0 3 0 8			
印 刷 者	世 和 印 製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總 經 銷	聯 合 發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所	台 北 縣 新 店 市 寶 橋 路 235 巷 6 弄 6 號 2 樓			
電 話	(0 2) 2 9 1 7 8 0 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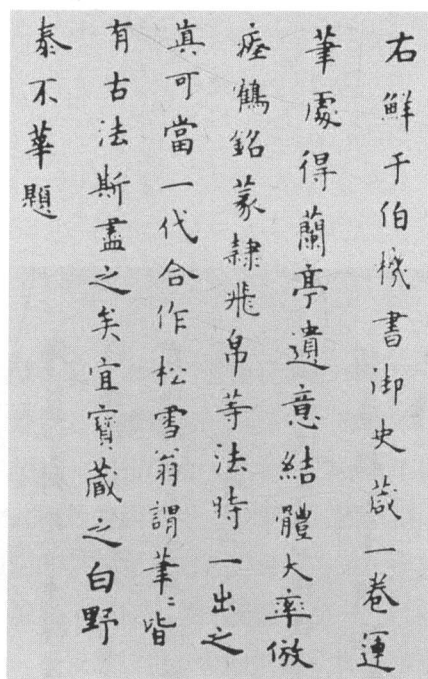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台北聯經書房更換。

ISBN 978-986-03-2794-6 (精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圖一 泰不華題鮮于樞〈御史箴〉

普林斯頓大學博物館藏。

Chinese, Yuan dynasty, 1260-1368

Tai Buhua, 1304-1352, colophon, undated

On Xianyu Shu 鮮于樞, ca. 1257-1302, Admonitions to the Imperial Censors (Yushi zhen 御史箴), 12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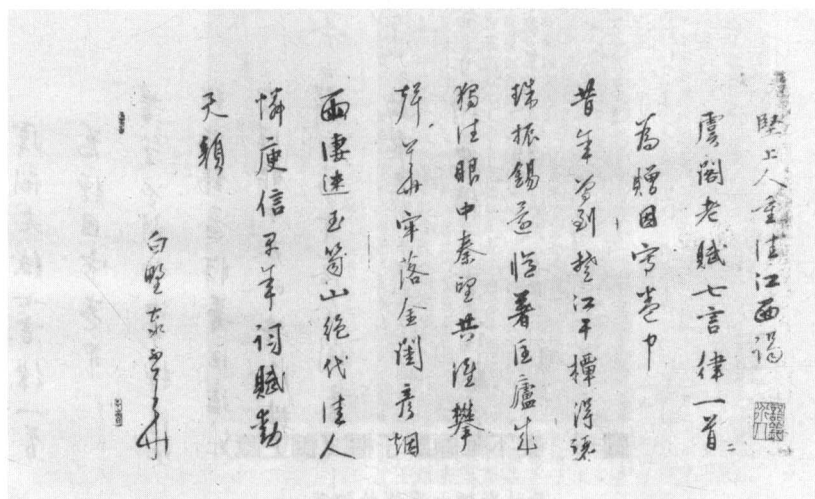
Handscroll; ink on paper

Calligraphy: 50.1 x 409.6 cm. (19 3/4 x 161 1/4 in.)

Colophons: 50.1 x 115.2 cm. (19 3/4 x 45 3/8 in.)

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 Bequest of John B. Elliott, Class of 1951

1998-49



圖二 泰不華書〈堅上人重往江西謁虞閣老書〉

《羅雪堂先生全集》，第5編，13冊，頁4293-4294。

今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序言

這本書的醞釀、寫作與增補前後長達二十餘年。1980年代在撰寫〈元代蒙古人的漢學〉正續兩篇的過程中，發現蒙古漢學者與漢族士大夫間往往聲氣相通，緊密結合，兩者之間存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色目漢學者也是如此，於是萌發出「多族士人圈」這一概念。1996年應中國文化大學主辦的第二屆宋史研究會議之邀，提出〈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初探〉論文，粗枝大葉的描繪了這一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運作的概況。一年以後以同一題目向國科會申請了一個計劃，當時寫成了一篇八萬多字的報告。過去十二三年來，又不斷充實、改寫各章節，陸續在兩岸三地的學報及論文集發表。最近則將一些已經修改過的章節加以統合，刪削重複，成為一部近三十萬字的專著，較1997年的報告，已擴充三倍有餘。

史學界前輩陳垣的經典名著《元西域人華化考》及拙著〈元代蒙古人的漢學〉的重點，都是在考述個別蒙古和色目人的漢學造詣。本書則顯示各族群士人間的社會文化互動，較上述兩種論著提高了一個層次，應該更能顯示元代多元族群社會中各族群不僅有矛盾與衝突，更有交往與交融，對元代社會，尤其是族群關係應該有更全面的掌握，這是我撰寫這本書的初衷與區區期許。

由於族群等級制度的阻礙，終元一代，蒙古、色目並未與漢族士

人融爲一體。真正的融合是在明朝取代元朝之後。本書〈結論〉中僅能做一簡單勾稽。至於蒙古、色目人與漢族融合的史實，仍待進一步的探討，恐需明史學者多加注意。

回顧多年來對本書主題的考述，可說是前慢而後快，前疏而後密。一方面是由於環境的變化。1994年前我仍身處新加坡，可說是個單幹戶，沒有學生協助資料的蒐求與排比。回台執教清華大學以後，研究工作得力於助理的襄助甚大。另一方面是由於研究工具的改善。近年來由於電腦的廣泛應用、網路資料庫的日益充實，各項史料收集較前容易不啻十倍。由於這兩方面的結合使本書內容更爲充實，論述亦益臻完備。

自從研究所時代開始，五十年來我始終從事元史研究，鍥而不捨，一以貫之。最近幾年來，則專注於整理舊著。如今《元代進士輯考》將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在即，而這本書的編成遂使我的主要工作告一段落。今後將重新出發，尋覓新課題，退而不休，繼續努力。

蕭啟慶

謹序於台北雲端書齋

2011年11月3

目次

序言	i
第一章 引論	1
第二章 元代蒙古、色目士人群體的出現	7
第一節 蒙古、色目文化背景	7
第二節 士人群體出現的階段	16
第三節 漢學者人數與族群分布	28
第四節 結語	34
第三章 社會網絡	37
第一節 同鄉	38
第二節 姻戚	67
第三節 師生	98
第四節 座師門生與同年	141
第五節 同僚——以翰林院與奎章閣為中心	164
第四章 文化互動	187

第一節 詩文唱酬·····	188
第二節 雅集·····	219
第三節 書畫題跋·····	253
第四節 編書贈序·····	314
第五章 群體意識·····	351
第一節 引言·····	351
第二節 漢法的鼓吹·····	351
第三節 斯文的傳承·····	358
第四節 綱常的扶持·····	362
第五節 中原歷史文化的認同·····	367
第六節 結語·····	381
第六章 結論·····	385
引用書目·····	393

第一章

引論

族際互動是中國史上各征服王朝時代的重要現象。征服王朝時代族群繁多，關係複雜，族際互動的疏密良惡不僅決定族群間的融合或衝突，而且密切影響當代的治亂與興衰¹。

元代為一多元社會，其族群之複雜，文化之繁富，在中國歷史上都可稱為空前。各族群間文化與政治上的相互激盪與彼此影響，構成元史研究的中心課題。而征服民族與主要被征服民族——漢族(包括漢人與南人)——間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關係尤為學者注意的一個焦點。但因牽涉廣泛，較為全面的著作，尚不多見。

過去不少學者認為元朝對漢文化抵制最力，而族群之間更存有明顯的政治與社會區隔。在政治與社會方面，蒙元史先進箭內互(1875-1927)之〈元代社會の三階級〉及蒙思明(1908-1974)之《元代社會階級制度》皆將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等四個族群視為不同的「種族階級」，強調其政治、社會、經濟權益相去的懸殊²。這種看法衍生

1 關於元朝的族群關係，參看蕭啓慶，〈內北國而外中國——元朝的族群政策與族群關係〉，收入蕭氏，《元朝史新論》(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9)，頁43-60。

2 箭內互，〈元代社會の三階級〉，收入箭內氏，《蒙古史研究》(東京：刀江書院，1930)，頁263-360；蒙思明，《元代社會階級制度》(北平：哈佛燕京學社，1938)，頁35。

出各族群之間存有不可逾越的鴻溝之錯誤印象，如日本學者村上正二即以「差別」與「隔離」來形容元廷的族群政策，而美國學者艾本華（Wolfram Eberhard, 1909-1989）更曾說：「蒙古人制定嚴格之民族立法。漢人既不可學習蒙語，通婚亦為法令所禁止。漢人不能供服軍役，亦不可持有武器」³。在元朝的所謂「民族立法」之下，各族群似乎成為相互隔離的絕緣體。

在文化方面，過去不少學者認為古來征服中原的遊牧民族或半遊牧民族雖然族類各異，最後都難逃漢化的命運，而元代蒙古、色目人對漢文化卻是抵制最力，因而漢化最淺。乾嘉史學大師趙翼（1727-1814）即主張：「元代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即大臣習漢文者亦少也」，意即元朝統治階級——包括蒙古人與色目人——多為漢文文盲，與漢文化枘鑿方圓，格格不入⁴。日本學者羽田亨（1882-1955）對傳統的吸收論最早提出批判，其〈元朝の漢文明に對する態度〉即主張：元代奉行「蒙古主義」，漢人及漢文化皆不受尊重。由於羽田氏為京都北亞史與東亞史之先進巨擘，數十年來日本學者一直遵奉其說為圭臬，而稱元朝之文化與族群政策為「蒙古至上主義」⁵。在西方，魏復光（Karl A. Wittfogel, 1896-1988）與馮家昇（1904-1970）之《遼代社會史》則自人類學「涵化」（acculturation）的觀點對吸收論

3 村上正二，〈元朝の文化政策について——モンゴル至上主義と儒者文化——〉，《歷史教育》第8卷第8期（1960），頁1-10；W. Eberhard, *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Leiden: E.J. Brill, 1965), p. 133.

4 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30，頁431-432，〈元諸帝多不習漢文〉。

5 羽田亨，〈元朝の漢文明に對する態度〉，收入《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歷史篇》（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57），頁686-687。

做出較有系統的批評。他們認為：征服狀態造成了族群間的鴻溝，征服民族與被征服民族不可能相互認同，完全同化。兩者的文化關係是雙行的涵化，而不是單向的「同化」(assimilation)。真正的同化僅在征服王朝崩潰，民族鴻溝消失之後始有可能。而各征服民族與漢文化之關係，每因其自身文化背景及所處歷史環境的歧異而有很大的差別。各征服王朝中，由半農耕、半遊牧民族所建立的金朝與清朝傾向於漢文化的吸收，漢化因而較深，而元朝則與同為遊牧民族所肇建的遼朝相似，對漢文化抗拒甚力，因而漢化較淺⁶。

上述的說法顯然低估了各族群之間的文化與社會關係，以致不少學者提出不同看法。陳垣(1880-1971)即為此一方面之先驅，其名著《元西域人華化考》考證了色目(即西域人)漢化士人一二七人之學藝造詣，顯示色目人在漢文化方面造詣甚高者大有人在，與當時漢族相較毫不遜色。陳氏此書對上述誤解的釐清起了部分作用⁷。楊志玖則自儒家思想的吸引力考述了色目人之漢化⁸。在蒙古人方面，神田喜一郎、吉川幸次郎、傅海波(Herbert Franke)、傅申、姜一涵、魏盟夏(Marsha Weidner)、羅賢佑、謝成林、李則芬等人之論著論述了元朝帝王之文學與藝術修養，皆認為中後期諸帝多甚崇尚風雅、嗜愛藝文，而且不無造詣，並非「不習漢文」⁹。至於帝王以外之蒙古人，

6 Karl A. Wittfogel and Chia-sheng F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 pp. 1-32.

7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北平：勵耘書屋，1934)。

8 楊志玖，〈元代西域人的華化與儒學〉，《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4期(1987)，頁188-203。

9 神田喜一郎，〈元の文宗の風流に就いて〉，收入羽田博士還曆記念會編，《羽田博士頌壽記念東洋史論叢》(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50)，頁477-488；吉川幸次郎，〈元の諸帝の文學〉，《吉川幸次郎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69)第15卷，頁232-313；Herbert Franke, "Could the

筆者〈元代蒙古人的漢學〉一文曾考述蒙古儒者、詩人、曲家及書家一一七人的生平及造詣，藉以顯示蒙古人並不盡為漢族精緻文化的門外漢，不少蒙古學者士人的漢學造詣足可與當世漢人、色目名家相互爭勝¹⁰。

本書擬自社會文化史的觀點，展示元朝各族士人間的互動關係，所擬建立的主要論點為：元朝中期以後，一個人數雖不龐大，卻是日益擴張的蒙古、色目士人群體業已成立。此一異族士人群體並非孤立於漢族士大夫階層之外，而是與後者聲氣相通，緊密結納，相互之間存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各族間共同的士人群體意識業已超越種族的藩籬，遂形成中國史上前所未見的多族士人圈。

本書所謂「士人」是一個文化群體，也是一個社會階層。自文化觀點言之，士人必須具有正統儒學教育與士大夫文化(literati culture)的修養，並接受儒家基本理念與道德準則的規範。因此，此處所謂「士人」兼含著重學問、德行之「儒士」與愛好詞章、藝術之「文人」。自社會觀點言之，其人可能為累世金紫的名公顯宦、可能為領率鄉里的縉紳，亦可能為一襲青衿的布衣，但都屬於備受尊崇的菁英(續)

Mongol Emperors Read and Write Chinese?" in Franke,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Brookfield, Vt.: Variorum, 1994), pp. 28-41; 傅申, 《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史略》(台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 1981); 姜一涵, 《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台北: 聯經出版公司, 1981); Marsha Weidner, "Painting and Patronage at the Mongol Court of China, 1260-1368,"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3; 羅賢佑, 〈元朝諸帝漢化述議〉, 《民族研究》1987年第5期, 頁67-74; 謝成林, 〈元代宮廷的繪畫活動〉, 《九州學刊》第3卷第2期(1989), 頁45-52; 李則芬, 〈元代諸帝的漢學修養〉, 收入李氏, 《宋遼金元歷史論文集》(台北: 黎明文化公司, 1991), 頁743-748。

10 此文收入蕭氏, 《蒙元史新研》(台北: 允晨文化公司, 1994), 頁97-216。

階層。因而，本文之「士人」與「士大夫」一辭同義，包含已仕或未仕的讀書人。雖然士人原為中原社會的特有產物，但士人的文化素養具有普遍性，可為異族人士所接受，凡接受士大夫文化的外族人士亦可視之為士人。至於精通其本族語文而不熟諳漢文化的外族人士則不能列為士人，因不諳漢文詩、書則與漢族士人之背景互不相同，雙方密切交往的可能性不大。為了避免學者對「漢化」一詞定義爭議之紛擾，本書稱外族人士接受士人文化之過程及結果為「士人化」(literatization)而不稱之為「漢化」(sinicization)¹¹。

士人化的蒙古、色目人大都完全浸潤於漢族士人文化之中。在現存史料中，幾乎見不到他們介紹其本族文化於中原的跡象。有如傅海波所指出：當時蒙古、色目士人，如高克恭、馬祖常、薩都刺等人的文學、藝術作品，不見異國色彩而與漢族士人並無二致¹²。藝術史學者石守謙也曾指出：

非漢族士人此時在融入中國之士人文化的過程中，對其書畫藝術的態度，大致皆經歷認同與學習的階段，反而罕見直接以其

11 「士人化」與「漢化」的區別：「漢化」之異族人士應已放棄其本族文化及族群認同，而與漢族同化，但可能僅接受漢人的「小傳統」(little tradition)，不必熟諳士人文化，歷代與漢族長期接觸的異族下層民眾大體如此。而「士人化」之異族人士雖接受士人文化，卻未必放棄其本族的族群認同，甚至選擇性保留其原有文化。元代中後期不少蒙古、色目人皆是如此，因為在征服情勢下，蒙古、色目人保持其原有的族群及政治認同對其實際利益有助。因而當時蒙古、色目士人往往存有族群及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之間相互矛盾的現象。參看蕭啓慶，〈論元代蒙古、色目人的漢化與士人化〉，收入蕭氏，《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頁55-84。

12 Herbert Franke, "Sino-Western Contacts under the Mongol Empire," in Franke,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pp. 47-72.

固有之書寫與圖繪來進行詮釋的現象。類似十七世紀郎世寧那種以西入中的手法，基本上在蒙元時期並未出現。這意味著蒙古人、色目人對融入原來士人文化的積極主動態度，此亦為其得以對書畫藝術進行全面而深入的學習之根本¹³。

石氏所論確是不錯，當時蒙古、色目士人確是以融入的態度從事藝文創作。近年來元詩學者楊鐮鑄造「蒙古、色目雙語詩人」一辭¹⁴，將我們習知以漢文創作的著名詩人如蒙古族的月魯不花、聶鏞，色目各族的貫雲石、王翰、脫脫木兒等都歸類為「雙語詩人」，卻未能舉證這些詩人曾以其母語創作。事實上，固然直至元代後期，不少蒙古、色目人可能仍以其母語為家庭用語，但漢文無疑已成為其教育與藝文之媒介。所以「雙語詩人」一辭仍有商榷的空間。

元代四大族群中，漢人、南人均屬漢族，在種族及文化上並無不同，差別不過是地域，故在本文中對漢人、南人不加區別，視為一體。契丹、女真之原有種族與漢族雖不同，但二者在元朝業已漢化並經官方劃分為「漢人」，在此視之為漢族，而不另列。因此，本文所謂「多族」乃指蒙古、色目、漢族等三大族群而言。

13 石守謙，〈衝突與交融：蒙元多族士人圈中的書畫藝術〉，收入石守謙、葛婉章主編，《大汗的世紀》（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頁210。

14 楊鐮，〈元代蒙古、色目雙語詩人新探〉，《民族文學研究》2004年第2期，頁5-10。

第二章

元代蒙古、色目士人群體的出現

第一節 蒙古、色目文化背景

蒙古、色目人與漢族的民族及文化背景大不相同，而蒙古、色目兩個族群之間及其個別族群內各族屬之背景亦互有歧異。因而，各族群士人階層出現之難易及先後頗有軒輊。

一、蒙古

蒙古人所處生態環境及生活方式皆與中原漢族差異甚大¹。成吉思汗(1206-1227在位)建國前後，多數蒙古部落皆為居住草原之上，經營游牧生活的所謂「氈帳中百姓」，少數居住於東自貝加爾湖、西至也兒的石(Irtysh)河間森林地區之部落如斡亦剌(Oyirad)及巴爾忽(Barqut)諸部，稱作「林木中百姓」，主要倚恃狩獵與採集為生。無論在草原或森林地區，農業皆微不足道，與中原經濟大不相同。

十三世紀初年，由於蒙古為一行國社會，文化缺乏累積。以前居住蒙古地區之突厥人曾有文字，蒙古人徙入後卻未能繼承。直到

1 關於蒙古早期的生態環境與生活方式，參看符拉基米爾佐夫著，劉榮焯譯，《蒙古社會制度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頁53-73。